

中國治亂形數研究錄

芹曝之獻



MG
D693.09
595

陳衍蓀致國民大會代表書

謹啓者，民八五四之時，任君矜頑致力學生運動，聲聞廣遠，心切儀之，民九衍蓀與金君臻庠，創辦寧波時事公報，專請著論，遂與論交，十八年旅滬後，過從益密，九一八瀋陽變起，君與朱子橋、查勉仲、鄒志豪諸先生策動社會賢達，組織抗日研究會，共商國事，其後輔助一二八抗戰之上海市地方維持會，及領導民眾協助八一三戰爭之上海市地方協會，皆發源於此，傍流所至，君與上海市商會鄭澄清先生密助韓國革命領袖金九先生，陰使尹逢吉謀刺日本大將白川，又先後與梁同芳、惲憲芳、吳泮庭、張子廉、王鐵民諸先生分別資助或主持血魂除奸團，嘗因發事，曾良首入獄，民國二十一年寫國際聯盟會李頓爵士調查團意見書，三十年寫三國演義的治亂觀，舉凡顛斷，頗多言中，勝利以還，君鑒於國事日非，苦心研究，不遺餘力，偶有所得，或著以為文，或言之於書，積稿盈案，不求聞達，附與司徒雷登大使之治亂形數圖序解諸文，及近與高斯先生陳納德將軍論中美問題書，暨與芝加哥大學郝欽斯校長論世界政府書，分析策劃，尤見精密，衍蓀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雖樗櫟之材，不足大用，然借花之獻，或可盡心，爰就任君書文，選錄足資時用者，編集成冊，販以與郝欽斯校長論世界政府書，及創設崇文學院徵求發起人啓，惟 諸代表之諒其愚而教之，則幸甚焉，專肅。伏乞 公鑒

國民大會代表處縣陳衍蓀拜啓



3 1799 3078 3

敬致國民大會代表諸公書

謹啓者，竊以治國之道，猶如醫者之治病，必須知病象，而察病源，然後循源考方，化虛補盈，病乃可愈，若或諱疾忌醫，非有藥石亂投之失，必有因循遺患之嘆，此觀勝利後中國之動態，國人所宜深思而善籌之也，夫國家者，猶一無形之舟，不能自爲行止安危也，行止之權，操於舟人，安危之象，成於環境，先賢論政，有危舟共濟之喻，此言舟人之力，足以制環境，環境安危之選，其權操之於舟人，果能誠於前失，同秉公心，共議避危趨安之改航，則風雨危舟，必能共濟，此審諸形數，觀之史例，有可取證而致信者也，昔者越敗於吳，勾踐爲虜，燕敗於齊，都城失守，危殆之狀，無可言喻，卒以愛民重賢，稱強致霸，增光史冊，今觀中國之形，旣無請成之辱，又無破敗之嘆，而觀之中國之數，既有廣大國土，又有衆多人民，則復興之圖，易於燕越，可以知矣。

諸公集議京都，代表全民，共策大計，此舟行安危之所託，亦國命存亡之所繫也，凡爲國人，俱應不自鄙薄，陳其一得，以爲芹獻，則竹頭木屑，或未必爲賢者所毀棄也，友人陳君若蓀，以頑研究國事，逾二十年，凡所論斷，間多證驗，囑舉證驗之實，詳陳觀察之言，獻於諸公，以資共議大計之參考。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國際聯盟會派遣李頓調查團來滬，調查日本侵略東北擾亂上海之暴行，蘋與陳君若蓀，合力寫印上海人民意見書，曾對之提出警告，論斷國際聯盟會若不依據盟約，制止日本之暴行，則其演變所至，不但足以引起其他國家，効尤日本，侵略國際聯盟會其他會員國。（說明一）而國際聯盟會亦且自陷於毀滅也。（說明二）其後果有意圖侵略阿比西尼亞，德國侵略歐洲各國，以

及國際聯盟會毀滅之事實，爲之證明，三十年四月，陳君蘋以論斷廿變，已見證驗，復曠觀察中日戰爭之結果，曾寫「三國演義的治亂觀」一文，載於寧波公報紀念刊，其間所論，斷案凡四，一斷屬於侵略陣線之德意日，必爲世界第二次大戰中之失敗者。（說明三）二斷日本必爲中日戰爭中之失敗者。（說明四）三斷中國尚有二三十年繼續之紊亂。（說明五）四斷世界之紊亂，亦具有五年至二十年以上之可能性。（說明六）今日觀之，皆成事實，三十四年十二月，與葉楚僑鈕楊生二宣慰使論國事，深慮勝利之果，未能確保。（說明七）三十五年七月，與夫人羅勃脫斯屈拉滋教授論國共，認爲馬歇爾特使之調解，未能有愉快之成就。（說明八）三十五年十一月，與內政部彭昭賢次長論政治，深慮美將專致力於日本。（說明九）三十六年十一月，與上海吳市長論美援，認爲美援必無問題，且有擴大數量之希望。（說明十）今年二月，與吳市長第七書，又論中國紊亂之年期，勢將延長至二世。（說明十一）凡此所言，初非特達之知，能爲占斷，實乃「天數論」（說明十二）自然變化之結果，茲特據此原則，本於研究所得，進與諸公論中國之病象，論中國之病源，并言治療之方法，則愚者千慮，陳其一得，芻蕘之言，聖人採擇，惟

諸公許而垂教焉，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言人之言行，發於思想，思想取資，在於效像，效像之本，則爲耳濡目染之近事，與夫前言往行之紀錄，凡前言往行足資紀錄而傳世者，必皆言行之選，乃爲言行之精華，此文化也，中國不患無文化，患在已得文化而不思用，與夫不知力學以取用之，前者罔之病象也，後者殆之病象也，罔殆病象，見於政治，而不之救，此一世之亂也，罔殆現象，見於教育，而不之救，此又一世之亂也，中國定亂，時斷二世，或非過慮，凡此所言，

雖為可見之勢，然非不變之情，此觀易學窮變之說，可以知之，果能研究病源，循源設策，觀機應變，量力論數順序變化而療治之，則必可縮短紊亂之年期，而實現富強之目的也。若論中國之病之來源，計凡有二，一為百年歷史之演變，一為三十年教育之措施，歸納言之，今日中國之病，實為百年歷史與三十年教育變化之產物也，一九四五年冬月，頗與葉楚倫錚楊生二宣慰使書，曾論及之，茲摘錄成為二文，附錄於下，以備參考。

弊政論源一

觀夫我國弊政之現象，論其原因，實發源於中英雅片之戰爭，以此一戰爭之結束，一方為歷史開割地賠款之紀錄，一方使人民受物質東漸之影響，割地賠款造因之擴大，使我國受繼續不斷之侵略，八年抗戰之戰爭，乃其最大之後果，而物質東漸造因之擴大，使人民見誘於物質，聽命於物質，且進而甘為物質之奴役，於是充慾害仁，求利失義，皆所不計，而潔身之說，廉明之論，遂失其用，社會道德之墮落，政治道德之敗壞，其故皆在於此，此兩袖清風之政績，布衣倣公卿之高風，所以不易多見於今日也。

弊政論源二

竊觀我國之弊政，若論其源，則近代教育之設施，實可觀察而論之，以近代教育之設施，重術科而不重哲學，因是使有求生之技術，而少為治之學養，故其為力，僅能抗有形之寇，而不能制無形之寇也。此就治亂循環之義，觀歷史演變之因果，則復員施政之失，實亦有其可原之情，蓋依據恕道，深加思索，知其人非果好為惡，實少充沛之學養，致使惑於誘，亂於利，而無自持之術也。此外困於自信，不求賢輔，重用役而不重用才，實亦致失之原因也。

敬致國民大會代表諸公書

敬致國民大會代表諸公書

四

以上二論，乃言致病之來源，第一來源之變症，斯爲自私與貪汚。第二來源之變症，斯爲驕狂與無能，然自私貪污驕狂與無能，皆非不治之症，亦非無所以治之之方，呂尚論政有曰，「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此往古治國醫病之驗方也。今日貪汚自私之病症，可用「財以啓衆」之術以治之，驕狂無能之病症，可用「心以啓智」之術以治之，如再以美國之援助，發揮「智以啓財」之力量，益以

蔣主席之威德，誠求「衆以啓賢」之實效，若是必可縮短四五十年紊亂之年期，而使中國富強之盛況，可於十年左右見之也。觀於燕越復興，爲時不足一世，而計以中國無待生聚之民衆，地未盡利之廣土，與夫推誠相與熱心愛護之盟援，則富強之圖，實在掌中，中國數形，足致富強，國際環境，可獲多助，是則持危扶顛，致富圖強。端賴

諸公，願竭忠誠，以澤兆民，翹企仰望，伏乞
明鑒。敬致

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諸公

任矜蘋弄聲

說明

(說明一)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國際聯盟會派李頓調查團來滬，余就言行反應之研究，動態趨勢之觀察，認為國聯會若不依據盟約，制止暴力，則其演變所至，必使國聯會其他會員國，續受摧殘，并將造成國際經濟之惡化，特請寧波旅滬同鄉會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等五公團體銜，寫一上海人民意見書，送請顧維鈞博士轉交李頓爵士以警告之，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 蓋自來戰爭之結果，不論勝敗，必有死傷，至若產業之損毀，戰費之虛糜，又必成爲戰爭以後毫無意義之紀錄，而雙方人民之幸禱，人類文明之進程，更不能不因人力物力之損失，發生不良之影響，且其影響所及，又須及於雙方有關係之其他國家也，證以最近世界各國經濟危難之狀況。失業統計之事實，則戰爭爲害，益見明顯，就此推想，國際條約之尊嚴，尤應重視，日軍暴力之制止，尤應迅速也。不然，祈求和平愛人類之中國，亦必爲忍無可忍情勢所逼迫，本其長期抵抗之決心，實行應付暴力之計劃，若果實行計劃，見諸事實，姑不論雙方人力物力之損失，即東方市場之毀滅，購買能力之消失，足以使國際間之商務與經濟，發生惡劣之變化，國聯愛護和平會員國之人民，將續受暴力之摧殘，可斷言也。(見與李頓調查團意見書印本，第三章，日軍暴力與國際關係，第五頁至第六頁)

(說明二) 余認爲國聯會若不辨別利害，自悟自決，以合謀暴力之制止，則國聯會必將自告毀滅，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 故下列各簽字者站於世界人類之立場，深望貴委員團謹慎詳思，辨別利害，因解人類厄

運，鞏固國際和平之要求，對於日本暴力，速謀聯合之制止，或施嚴重之懲罰，此為國聯會應負之責任，亦即各國代表應負之責任也。倘國聯會至此猶不自悟，猶不自決，則恐公正代表及世界輿論所發國聯自殺之呼聲，或不幸而成為讖語也。（見與李頓調查團意見書印本，第三章，日軍暴力與國際關係，第六頁）

（說明三）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與余合力編印致李頓調查團意見書之陳荇蓀君，以余觀察世變，已有證驗，請余再寫一文，以觀察中日戰爭之結果，余就「自然數字」演變之研究，觀察世界動態之趨勢，寫一「三國演義的治亂觀」，刊於該年五月出版之寧波公報紀念刊，論及世界戰爭，斷定世界製造禍亂少數人類之侵略國，必遭失敗，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根據世界範圍內最近「自然數字」的動態，觀察他未來的趨勢，可以斷定製造禍亂的少數人類，一定歸於失敗，雖然接近火燄愛護治安的人類，祇有中國和英國不惜犧牲，百折不撓的向製造禍亂的少數人類抵抗，遠離火燄愛護治安的人類，祇有美國仗義的呼號與行動，其他愛護治安的人類，或因威逼利誘，或以畏懼犧牲，中途屈服，或以禍未及己，偷安一時，不為切實的行動，但是「自然數字」動態的演變，確在使愛護治安的人類，走入聯合團結的途徑中，等到這聯合團結的勢力，能超過製造禍亂的人類時，製造禍亂人類的失敗，也就無可逃避。（見三國演義的治亂觀抄本，第二十一頁至二十一頁）。

（說明四）余就當時國際動態之研究，以及人心情勢之觀察，認為蘇聯英美俱不出賣中國，則日本必為中日戰爭中之失敗者，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就目前情勢觀察，假使蘇聯英美俱不出賣中國，中日戰爭結束的推斷，祇有下列兩個方

式。第一、日本澈底覺悟，以無條件實行退兵，請求中國諒解，彼此化敵爲友。第二、日本被中國戰敗，完全退出中國。（見三國演義的治亂觀抄本，第三十頁至第三十一頁）

（說明五）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胡適之博士嘗論斷中國復興，尚須靜待五十年，余就歷史治亂循環之研究，以及人心動態之觀察，認爲亂之年期，定爲五十年，并不太長，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在哲學與物力戰爭勝敗的行程中，再去分析近代中國歷史，道光以後的時期，可稱爲亂的醞釀時期，辛亥革命，可稱爲亂的爆發時期，辛亥以後，可稱爲亂的進行時期，這個亂的路程，長度若干，需要多少年期，方可走完，現任中國駐美大使胡適之博士，曾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實行抵抗侵略以前，根據他的觀察，論斷中國復興的時間，尚須靜待五十年，不能說是太長。（見三國演義的治亂觀抄本，第二十八頁）

（說明六）民國三十年，世之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未來結果者，認爲結束第二次世界戰爭，以三年爲最長的年期，余就論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結果，認爲乃係亂的「中止」，而非亂之結束之見解，認爲第二次世界戰爭之結果，非有瞭解哲學之大政治家，未必能將世界「由治入亂」的歷史，變爲「由亂入治」的歷史，因此對於世界大亂的結束，提出至少三年，多則五年十年，即二十年以上，亦頗可能之估計，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甲）至於製造禍亂人類無可逃避的失敗，究竟何時，可以見諸事實，就目前趨勢的推斷，至少尚須三年，多則五年十年，就是二十年以上，亦頗可能。（見三國演義的治亂觀抄本，第二十一頁）

（原文乙）這次世界大亂的未來結果，既然根據「自然數字」的動態，斷定製造禍亂的人類，一

定歸於失敗，而對於失敗實現的時期，却提出了三個不同的答案，這三個答案中，在許多觀察家的評斷，以爲第一個答案，是這次大亂結束的最長時期，其實根據目前「自然數字」動態的演變看去，第一個答案，最少能成事實的可能性，除非世界上各國的政治家，能够瞭解哲學，能够應用哲學，能使哲學發揮其最大的價值。（見三國演義的治亂觀抄本，第二十一頁）

（說明七）民國三十四年，余觀中國勝利後之動態，頗感失望，是年十二月與葉楚僧、鍾揚生二宣慰使書，深慮勝利之果，未能確保，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故兵家論戰，每言守勝之難，以因勝而驕，因得忘失，乃係庸人之常，而爲守勝之害，思先賢謙滿之論，觀往史興亡之跡，義益顯然，我國今日之地位，固爲戰勝之國家，且與英美蘇聯，同列四強之林，然觀之軍備，觀之政治，觀之經濟之現象，實知不如遠甚，僅文化有勝人之質，然又惜無勝人之量也，再觀戰後之現象，在政有復員施政之失，在軍有共軍割據之私，究其所自，實亦因勝而驕，因得忘失，有以致之，若不糾正其非，因循而處，不能力謀建設，求與人齊，則勝利之果，能否確保，誠爲疑問。（見與葉鍾揚二宣慰使書抄本，第一頁至第二頁。）

（說明八）民國三十五年七月，美國駐華第七艦隊司令金開德將軍介紹羅勃脫斯屈拉滋教授來滬訪問，研究中國是否足以協助，及有無協助之方法，余友章榮初君約余與之相見，余就中國歷史之演變，以及人心之動態，告以協助中國之方法，以及中國足以協助之證據，羅氏聽之，甚感興趣，請余寫一文件，並以馬歇爾特使調解國共，能否成功，舉以相問，余告以未能有愉快之成就，後在與羅氏論中國問題書中，及與黃任之先生第二書中言之，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甲）故就今日情勢言，倘和平談判，不能在謙讓空氣中，獲得愉快之成就，則將「以大事

小」之哲學，溶化於政治之中，以求現狀之「化善」。實為最合人心最合病源之措施，如果共產黨諸領袖之心胸中，同具偉大之哲理，亦可採取中國歷史上「以小事大」之哲學，溶化於政治之中，對國民黨為政治之競爭，而解除人民不應受之痛苦，使之分別努力於復興建國生產之建設，若是則中國和平團結之希望，雖一時或不能實現，而中國國力之培養，可以不受損害，換言之，在國共兩黨同意爭團結之前，可以先行完成一建立現代富強國家之基礎。（見與羅教授書抄本，第十二頁）

（原文乙）晤談之後，曾以馬歇爾元帥調解國共之結果相問，蘋告之曰，余固望調解之能奏功，但就中國歷史演變觀之，則恐未能有愉快之成就。（見與黃任之先生第二書抄本，第一頁）

（說明九）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余與內政部彭昭賢次長論上海政治書，鑒於當時世界之動態，及中美間之情勢，深慮美將專致力於日本，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蓋我國今日之情勢，若以史例言之，我不如勝越之吳，日則遠勝諸成之越，重讀沼吳之史，難遏憂亡之淚，再觀國際之形勢，則知我之軍備，顯然不足防止任何現代國家之攻擊，其能僅創外蒙，而獲勉強之生存者，實賴美國倡導世界和平政策重視我國之力耳，若不幸此缺乏意識反美之諷刺，迫使美國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塵，又當孤立，或變更其倡導世界和平政策之方式，而專致力於日本，試問二十年後，我果能不為吳史之續乎。（見與彭次長書抄本，第三頁至第四頁）

（說明十）自馬歇爾特使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返美以後，援華政策，似成懸案，惟余認為美國對於援華政策之不實行，咎在我之不知進取，若果循數謀化以進取之，不但美援必可獲得，且可擴大其數量，三十六年六月與蒙藏委員會許委員長書，同年十一月與上海吳市長第四書，俱曾言之，錄其原文如後：

說 明

六

(原文甲) 親夫馬歇爾國務卿在普林斯登大學之演說，及四國外長會議前後動態與返美後之報告詞，已顯然重視歷史，重視政策，蘋與羅氏書，已於一月八日以華文本寄顧大使，嗣又以譯本託陳納德將軍寄馬卿，故馬卿詞意，雖未敢認為係受蘋與羅氏之書之影響，然所見相同，似有可證，昔者劉備敗於曹操，遁逃無所，賴孔明往說孫權，止敗為勝，而成蜀漢之業，此孔明審情觀勢，變數取助之功也。今美之助我，發於本意，乃竟不知善取，坐視其去，古今之人，所謀不同，何相遠耶，孔子論事，重視本末，是就當前現象，求其兩端，以謀善處，此數學也，進而論政，重視率性，重視用德，此化學也，循數謀變，則中國之事，非不可為，實不為耳。(見與許委員長書抄本，第一頁至第二頁)

(原文乙) 今美之援華，發於本意，且有勸我犧牲雅爾達協約權益之關係，更有環境之勢，歷史之例，與夫發展商業之期望，可資運用，若能善於用數，進之使變，則我之獲助，宜先於歐洲，茲者亡羊之失，已成事實，補牢之圖，似不可緩，蘋存杞憂之心，竊常尋機陳言，去年言之於美人羅教授，今年又譯寄其書於馬歇爾，嗣以魏德邁之訪華，乃與司徒大使第一書，後讀蒲立特氏之言論，又與司徒大使第二書，凡此所為，皆係不間收穫之耕耘，雖知精衛填海，無濟於事，惟念匹夫之責，在求自安而已，謹再錄奉第二書，請賜批覽，仰乞垂教，或認間有可取，擬請轉達上海市參議會之訪美國，并促其行，蓋最近周以德之呼籲，范登堡與杜威之議論，皆在助我用數，惟其用數之源，發於防蘇，尚非建治亂之至道，以既不足服華衆士派系之心，亦無以塞蘇聯戰爭販子之口，若以呂尚「強而弱忍而剛」之哲理，能隨機應變，廣言於美，則化攻制暴之理明，以柔克剛之道用，更就蘋之歷史透視論蘇聯，第三國際探源論，哲學政治價值論諸文，及與司徒大使第二書之所言，修創變化而善用之，不獨足顯中國文化之價值，且可息援助乏術之懷疑，而堅其援華之心，擴大援華之勢，乃意中事。

(見與吳市長第四書抄本，第一頁至第二頁)

(說明十一)余於民國三十年觀察中國情勢，雖斷中日戰爭必獲勝利，然深慮尚有一三十年繼續之紊亂，但觀之勝利後之現象，又慮中國紊亂之年期，勢將延長，三十六年一月，與王曉籟先生書，同年五月，與黃任之先生第二書，俱曾言之，今年一月與上海吳市長第七書，且斷言紊亂延長，須達六十年，錄其原文如後。

(原文甲)研究今日國是問題之目標，在於如何縮小中國紊亂之範圍，與如何縮短中國紛亂之時間，若就歷史演變趨勢言之，中國紛亂之範圍，雖已較可能產生者為小，而紛亂之時間，或須超過蘋民國三十年之推斷。(見與王曉籟先生書抄本，第二頁)

(原文乙)民國三十年四月，蘋應友人陳荐蓀兄之約，寫一「三國演義的治亂觀」，其間所論，重要斷案，舉凡有四，第一言德意日必為第二次世界戰爭中之失敗者，第二言若果蘇聯英美俱不出賣中國，則日本必為中日戰爭中之失敗者，第三言中國至少尚有一三十年繼續之紊亂，第四言世界之紊亂，亦具有二十年以上之可能性，第一第二兩斷案，俱已成為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上之陳跡，第三第四兩斷案，觀之今日情勢，似亦絕非過慮，更就最近國內動態以論之，則深覺繼續紊亂之年期，頗有延長之變也。(見與黃任之先生第二書抄本，第三頁至第四頁)

(原文丙)十七年前，蘋對中國定亂之觀斷，論其年期，時須一世，今日論之，則深慮將變二世矣，此觀於廟堂之象，教育之情，不能不與杞憂也。(見與吳市長第七書抄本，第一頁)

(說明十二)余於民國三十年瞭解天數二字之意義，民國三十六年六月與許委員長及陶百川先生第二書，亦言及之，錄其原文如後。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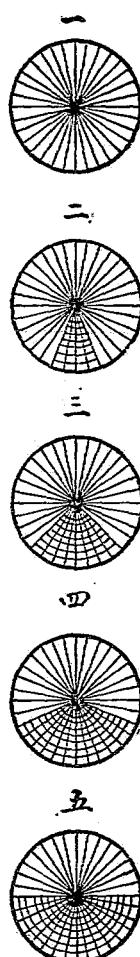
八

(原文)因得共談「天數論」，所謂「天數論」者，非如神道設教者之所竇，以爲治亂之成，由於天命，實則治亂形成，基於「自然數字」變化結果之意也，蓋在每一範圍之中，皆有「爲治」「爲亂」兩種「自然數字」之存在，此即「爲治」之人羣，與「爲亂」之人羣也，故每一範圍之治亂，觀之範圍中動態主動權之所屬，可以知之，此先賢論政設策，所以有「觀情審勢」之言也，所謂「觀情審勢」者，乃就情之動態，究其來源，察其趨勢之謂也，惟能知動態之來源與動態之趨勢，然後循源設策，施之於政，若是則情可化，亂可止，此即先賢「人定勝天」之論也。(見與陶百川先生第二書抄本，第一頁，許書見附文。)

治亂形數圖序

竊以天下事變，皆始於一，一變爲二，二變爲四，四變爲八，八之遞變，可至無極，此易學八卦論數之理也。事之爲始，基於言行，言行之源，發於性心，性心之動，感於效象，易曰：「爻者，效此者也。象者，像此者也。爻象動於內，吉凶生於外」。此性心之動，言行反應之變之道也。故以八卦論數之理，折性心言行之變，則事之治亂，觀於吉凶之數之損益，可以知矣，而治亂之變，成於吉凶損益之數之轉移，亦可知矣，此先賢之論治亂，所以皆歸之於數也，能知數之爲形，能知數之爲變，則能知所以處理治亂之道矣，夫治亂爲形，其數有九，曰大亂、曰中亂、曰小亂、曰近亂、曰相平、曰近治、曰小治、曰中治、曰大治。故論治謀變，在強治數之力，以弱亂數之形，此以變化之術，轉移治亂之勢之義也，惟變之道，在能觀形審數，量力循序以求之，若不計其數，不量於力，而謀越序之變，則可斷謀必敗，而變必無功，此先賢論事論政，所以有「欲速不達」之諭也，今觀世之論政者，或以越序求吉，此有「過之」之失，或以縱凶期和，亦有「不及」之謬，因爲治亂形數圖，而爲之序，庶今之在位而有處理治亂之權者，或可藉爲用中化亂之資乎。

治亂形數圖



- 一、大治之形
二、中治之形
三、小治之形
四、近治之形
五、相平之形
六、近亂之形
七、小亂之形
八、中亂之形
九、大亂之形

治亂形數圖解

圖之爲形凡九，曰大治、曰中治、曰小治、曰近治、曰相平、曰近亂、曰小亂、曰中亂、曰大亂，夫愛好治安，本爲人情之常，而治安寄託，在於生活之無憂，故治民爲政，在取有餘，而助不足，在足衣食，而廣教化，教化之目的，在制不知足，而勸勉博愛，愛之大者，在防攻衛國，輔政監政，以愛一國之人羣，愛之小者，在扶貧濟困，養孤安寡，以愛一地之人羣，爲政如此，治道畢矣，亂之孕育，發於生活之不足，怨於行政之失中，熾於私慾競發，而利用憂怨，至憂怨誘於私慾，因於私慾，亂遂成形，圖中白色，爲愛好治安之常情，範於黑綫之方格，憂怨困誘於私慾之象也。弭亂之道，在解憂平怨，化懲私慾而已矣，解憂平怨，化懲私慾，在以仁義爲政，而以「爲而不恃」爲心，此「無爲」之治，大同之治也。「無爲」之治，足以廣衆弱敵，制勝天下而致大同，是則治國治民之士，宣可觀於圖，審於「治國平天下」之哲理，而深思之焉。

治亂形數圖再解

治亂形數圖之圖解有曰，「圖中白色，爲愛好治安之常情，範於黑綫之方格，常情困誘於私慾之象也」。觀此圖解，每圖吉凶之數顯矣。夫白色乃吉之數也，黑色則凶之數也，大治中治小治近治之形皆不論，試以大亂之圖觀之，吉數相積之總和，必多於凶數相積之總和，可無疑義，而化亂爲治之道，亦思過半焉。蓋圖中白色之數，皆可取以資治者也，取之之道，在助以謀生之財，堅其足防之力，使內無生活之憂，外無盜匪之患，一格相安，數格相聯，若是則吉凶之數變，而治亂之勢亦變矣，

治亂形數圖解

此國棋教危求勝之理也。呂尚曰：「禍福在君，不在天時」。又曰：「削心約志，從事無爲」。夫君者，有權之士，亦主治之心也。天者，非至高之威，乃及時自然之數形也。明乎此，則「人定勝天」，義在其中。「人定勝天」之柄，在約志以廣賢哲之輔，削心以求順序之變，而復以「無爲」從事，以感應萬庶之情，如是，則以仁爲化，以義爲憲，權在掌握，而亂之化，數之變，勢之移，且相隨俱至，因可順人情以懷天下矣。

治亂形數圖三解

治亂形數圖之爲象，大者像世界，次之像國家，小者像地方、像團體、像家庭、像個人，其理皆同，孔子論政，以「修齊治平」爲最高之原則，以「止於至善」爲最遠之境界，而爲政之道，以善言善行爲基礎，以率性成教爲方法，以始於一毫爲起點，而以千里之鷹爲目的。此皆自卑而高，自近而遠，量力順序，謀變進善以求大同之義也。若是，以知始知變知終之智，就觀圖參數順序之衡，察機量力，用仁用義以變之，則個人可變，家庭團體地方可變，國家世界亦無不可變矣。

治亂形數圖四解

寡嘗論之，一國當前治亂之現象，每爲一國過去歷史演變所形成，一國過去之歷史，一國過去人羣言行變化之記錄也，若是可知一國當前治亂之現象，實爲一國過去人羣言行變化之產物，而現象之所以爲治爲亂，則人羣言行善惡之數總和之損益爲之也。若過去人羣言行善數之總和，多於惡數之總和，則其當前現象之形，必爲近治、小治、中治、或大治，可無疑義。反之，則其當前現象之形，必

爲近亂、小亂、中亂，或大亂，亦無疑義，於是可知一國未來之現象，論其爲治爲亂之權，實操於今日一國之人羣，故今日愛國憂亂之士，果欲期國家未來現象之趨治，益以善言善行之數可矣，善數之益，惡數之損也，損益相易，其形自變，此先賢「人定勝天」之論也，思孔子勿以善小勿爲之誠，與夫善言千里之應之說，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明矣，而在位主政之士，責任之重，尤可想而知，盡責之道，不須遠求，在能熟讀曾國藩之原才論，若更益以六韜十七問之運用，則不獨一國治亂之勢可以變，而世界治亂之勢亦且隨之俱變矣。

興亡原理論

呂尚論道有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又曰：「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夫道者，治事之術，亦爲政之術也；治事爲政，俱以廣助爲原則，柔而靜者，親衆致和之理也；恭而敬者，求才任賢之理也；強而弱，忍而剛者，化攻制暴之理也。親衆致和，求才任賢，化攻制暴，各適其宜，以之治事，則無往而不利；以之爲政，則可無敵於天下，若見善而怠，應斷不斷，知非而處，不獨不足以求至善，實散衆敗事待亡之道也。今日之政，近於前乎，近於後乎，近於前者，姬周之興，不足專美，近乎後者，亦可悟而自反，審史以求爲姬周也。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史者，萬事之紀也。」是則爲政圖治，實不可不師前史也。

散微圖易戒失論

夫治之於未亂，謀之於未兆，皆「其幾易散」之義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此圖難於易之理也。「以暴易暴」，「以燕伐燕」，此乃不可以失懲失之誠也。知乎此，則守國爲政，止亂圖治，道在其中。湯商姬周之地，少於若夏若殷，其民亦少，然觀之史，卒有以湯易夏，以姬易殷之紀焉。此無他，以湯商姬周之爲政，異於桀紂而已，一則以猛，一則以寬，一則以剛，一則以柔，剛猛爲散之道，寬柔爲聚之道，知寬知柔知聚，復能之於失，則散微圖易，如反掌矣。今中共之地，中共之民，皆小而且少，再衡其行，則猛而且剛，而謂制之無術，豈果無術耶？非無術也，是宜觀史慎思，循寬循柔，善用散微圖易與夫誠失而已矣。

附文

世事變化論

二

凡天下「人爲」之事，小者如二人之好合，或二人之鬥爭，大者如國際之聯盟，或世界之大戰，論其來源，皆始於言行之反應，與言行之演變。若論言行之源，在於心性，此先賢計事論政，所以有觀情審勢，率性利導之言，又有一言喪邦，一人定國之說也。以人言之善，能藉聽者心性，則應必為和，應必為助，和助相積，其數漸強，或聽者心性，斷為失宜，則應必為默，應必為勸，勸默相積，其數漸弱，此禍福之事之所由成，亦禍福之事之所由變也。若論人之心性，善惡之數，本兩具之，或為賢者，或為不肖，此心性善惡數字之多寡，接於人事文化自辨取舍而成之，堯之重執中，舜之善用中，此知心性善惡者聚之數，而欲導之以政，化之以教，以益國之善人，以益國之善事，使俗以化，政以成，此孔子所以有頌舜之言也。孔子論道，觀智愚賢不肖之言行，皆未能致益於時，乃興「過之」與「不及」之嘆，復以頌舜之言，以自答其「道其不行矣夫」之間，此明知世亂之可變也，變之道，在於率性，在於用中，在於進「不及」而退「過之」，若是則言行之變，共趨於中，而「過之」與「不及」之數弱焉，「過之」與「不及」之數皆弱，而人心乃平，衆意以聚，時勢遂可變矣。

文化救失論

夫人之言行，始之於思，思之來源，基於效像，效像取法，或本於耳濡目染動態之事實，或本於前言往行紀錄之傳述，凡前言往行足資紀錄而傳述者，必皆有益人羣言行之選也。此為言行之精華，亦即寶貴之文化也。聖賢知文化之可貴，知善言善行之足法，乃興學授教，期人與善而求致益於人。

羣，且進病不教而誅之政，倡變化氣質之說，蓋知人之皆可變而學善，又知所以學不善之原因焉。以此言之，則家庭之不和，國體之重爭，地方之不安，國家之紊亂，究其原因，必由言行取法之失而致之，救失之道，在循變化氣質之說，善用文化以變之，一人變善，衆人從之，衆人變善，則家庭國體地方國家必隨之而俱變矣。

中國潛力論

孔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其本末，可以論物，知其終始，可以論事，夫合抱之木，一竚始之也，至治之道，一念始之也，凡欲木之茂者，選其實，擇其土，詳究種植灌溉之法，而復證之於老農，則無失矣。欲國之治者，觀其情，慎其政，審思推行運用之術，而復聽之於民心，則亦無失矣，此孔子論政，所以主親民而重施德，親民者，知情之道也，施德者，輔育之道也，立法行政，若以知情爲基，而以輔育爲用，則政法行，而民心歸聚，民心歸聚，民力之用之始也。越之滅吳，燕之報齊，論事之始，在於愛民，能愛民，則民樂爲之死，輸財輸力無論焉。今中國之民，逾四萬萬，不須待生聚也，若善用其力，可以闢荒蕪，致富庶，而強國家，民富國強，勸以衛國爲榮，則爭爲先赴，且無強敵焉。是爲中國富強之力之所潛藏，啓之可得，若不爲之啓，而反閉之，此其爲政，病在司啓而失其道，是則有守國主政之責者，宜察其所失而正之，則強國富民之基，在於斯焉。

率性啓智論

夫人之言行，或發於心性之所需，或發於心性之所感，心性所需，自動之衆也，心性所感，被動

之象也，故治民之道，應本思善之心，究其受染之性，廣施文化，啓其理智，藉堅自動之力，以弱被動之勢，若是則人將習於役環境，而不爲環境所役也，於是無形之寇，必且無能爲力焉，今日中國之弊，或始之於私慾，或始之於錯覺，私慾錯覺，皆無形之寇也，試論今日之學生，觀其言行，敢斷誤於私慾者少，而誤於錯覺者多，斯其爲形，方陷於無形之寇，宜悲其遇而救之，救之道，在用切時之說，以顯明中國文化之價值，則學風之變，必有可期，此呂尚心以啓智之理，亦孔子率性施教之義也。

剛柔論（一）

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乃柔可克剛，文勝於武之說也。孟德曰：「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此乃以武輔文之說也。孔明曰：「剛不可折，柔不可卷，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此剛柔并重之說也。孔明孟德俱知剛柔之理，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故孟德佔一時歷史之勝，而孔明收後世人心之頌，此則「有爲」「無爲」之異，足資治國治世者之深思焉。

剛柔論（二）

夫爭與取，剛道也，讓與予，柔道也，故善處事者，以讓止爭，善爲政者，以予生取，以讓止爭，爭化而安至，以予生取，取之必有餘，於此，可明以柔制剛之益，可見剛柔相濟之利，故不知剛柔之理者，不足以論事，亦不足以論政，有痛悉事亂政之危者，宜循此理以求其失，而爲之正，則國治民安之道可由焉。

言行反應論

言爲心聲，聲發則行見，行見則應生，應生則變至，變至則事成，事成有吉有兇，吉兌之化，則爲禍福，禍福之基，在於義利，聖賢重義輕利，故曰「執中」，故曰「和爲貴」。此處禍福之間，示人重義輕利抑禍避禍以求和，和爲讓之道，讓與則爭止，爭止則安樂生，安樂生則萬物育，是則和也者，孔子所謂中庸也，故治事之道，貴在慎始，慎始之端，寄於慎言，慎言之則，在於能權義利而用其中。

環境變化人生論

語云，近朱赤，近墨者黑，又曰，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此言人生與環境之關係，深言之，知人之未有不受制於環境者也。故人少時，相聚言志，或執筆爲文，多以治平之望，慨然自許，蓋同學相處，耳濡目染，俱爲史書，性之相近，有以使之然也。及其既壯，出而應世，觀夫言行，每見有異，是因社會人羣，困於物誘，輕義重利，習之相遠，有以使之然也，於此，可知社會道德之日非，政治道德之毀敗，有所由矣，而國之亂，世之亂，其源亦在於斯，是故欲國之治，世之治，必須爲國爲世建設致治之環境，此則「脩齊治平」之學，誠足使吾人之深思焉。

成事程序論

附文

事成於行，行成於思，思成於學識見識之選擇，選擇之道有二，其一聽命於性，其二聽命於理，聽命於性者，志在安己，聽命於理者，志在安羣，間有能安羣而不能安己，則當衡諸仁義，而知用順用忍用忠用恕焉，順為孝之本，忍為和之始，若忠若恕，則為明德之始基，能明明德，可以治事，可以教人，可「止於至善。」

政法影響論

凡言行為衆人而設者，於言謂之法，於行謂之政，故政法之立，必以順人情為原則，凡能合此原則者，謂之善良，違此原則者，謂之暴虐。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此言言行之影響，亦可據以知政法之影響焉，是則立法施政，可以知所慎矣。

古今同理論

或曰，今之世，異於古之世，海禁既開，器物各殊，而欲以古之理，為今之用，不亦悖乎。曰，海禁之開，人地之廣也，器物之殊，技術之異也，而人之心性，人之言行，人事變化，仍猶是也。竊人因心性之動，而為言行，因言行反應，而變萬事，因萬事所需，而用器物，二人之鬥爭之相和，其情如此，多人之鬥爭之相和，其情亦如此，甚至兩國或多國之鬥爭與相和，其情亦莫不如此也。夫浮木之行水，樓船之行水，與夫機艦之行水，其行水相同也，所異者，緩速安危而已，石塊之傷人，刀槍之傷人，與夫砲彈原子之傷人，其傷人相同也，所異者，輕重多寡而已。理者，生於心性之所需，

或心性之所感，是則理也者，實生於內而用於外，今者人地器物，雖變於外，而心性需感生理之道，無所變於內也，人之聽命於內，而運用外在之器物，亦無今昔之異也，而謂古之理，不足爲今之用，豈其宜乎。

真知論

知不能言，非真知也，言不能行，非真知也，必知而能言，言而能行，斯爲真知。夫知者學之獲也，學而獲之，不能言之以喻於人，如未獲也，言之能喻於人，而不能行之以信於人，如未獲也，必能言其所知，以喻於人，行其所知，以信於人，人斯樂受樂言而樂行之也，此爲真知，此爲知之至也。

創設崇文書院徵求發起人啓

天道論（三十六年十一月與黃任之先生第四書）

老子曰：「功遂身退，天之道」，夫天之爲照，無所不及，及於植焉而生，不以爲功，及於不植而無所生，不以相責，蓋重在爲予，而不責不取也，不責不取，固無益於滋生，然可無害於爲照，亦可無害於所可生，若不取而責焉，責則爭，爭或有害於爲照，有害於所可生也，孔子知其理，心焉憂之，乃以頌舜之言，以進「道其不行矣夫」之嘆，孔子以舜善用中，又知用中足以進「不及」而退「過之」，進「不及」與退「過之」，乃求中齊一之道也，求中齊一，化在其中，治在其中，故頌而稱之爲大知，大知者，殆反映其昔之所未知歟，因重言之，深期後世學者，能持其知，善於用中以濟世也。

天數論（三十六年六月與蒙藏委員會許委員長書）

夫天數者，非天能使之治亂之謂也，天乃自然之義，天數即自然數字變化之謂也，所謂自然數字變化者，即係爲治爲亂人羣言行之變化也，故論史之士，每言今日之亂，實生於已往之史，夫史者，爲治爲亂人羣言行變化之紀錄也，於是知今日之亂，實出過去爲治爲亂人羣言行變化所形成，若是，則未來之治亂，寄於今日爲治爲亂人羣言行之變化者，從可知矣。

爲政在人論（三十四年十二月與葉楚僕錚惕生二宣慰使書）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在，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是則國之治亂，不在政制，而在人事，可以知矣，故先賢樹人，必教敦品，必教安貧，敦品則不辱，安貧則不貪，若果敦品

安貧之士衆，則廉明之政，樸厚之風，自可并見於朝野，證以曾氏原才之說，重才之事，其義益顯，惜其時國之大權，操於異族，致曾氏之才，未能大用，况知候生之諫，僅能勸秦皇之聽，而不能使秦皇爲堯舜也，故觀其生平，除勤政愛民立德立功而外，又復重視立言也。又觀漢史，孔明有王佐之才，因困於由治入亂之時勢，卒無以王蜀漢之業，凡此所言，舉以證治亂循環之說，而爲今後求治之參考也。

爲政之義論（三十五年十一月與內政部彭次長昭賢書）

夫爲政之義，在謀現狀之改進，而改進現狀之目的，在爲政府集民心，致民力，以民爲邦本，非如此，不足以期本固邦寧之效也，今者抗戰勝利，已歷一年，而動亂現象，迄未寧止，索其因果，屬於史爲之者半，屬於政爲之者亦半也，救弊之道，應循史之演變，察時勢，觀民情，因勢順情而利導之，則化亂致治，實非不可期也，孔子論政，以率性親民爲原則，重視用德，以求千里之應，此以德化育之道也。蓋德之於政，具有化善之因素，若善用之，不獨可使近者悅，亦可以使遠者來。

窮變分析論（三十六年十一月與上海吳市長第四書）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世事可變之理也，聖賢知世事變化，無時或息，又知變化兩端，必爲終始，變之終者，變之窮也，變至於窮，勢必自變，勢必自通，此又治亂循環之理也。昔者閉關自治，未見強鄰，明哲之士，猶可嘆息退隱，以窮變之任，期之後人，然五胡亂華，滿蒙入關，仍不能免，今則不然，強鄰相環，顯然可見，若論其力，甚於五胡，甚於滿蒙，此非明哲保身，嘆息退隱

，而以窮變之任，期之後人之時也，必須求機造勢，謀變制變，此為英雄時勢之說，亦人定勝天之論也，寡恩呂尚「禍福在君，不在天時」之訓，觀之湯商姬周燕王勾踐之史，益知世事非不可變。非不可為，實人不欲有為以變之耳。

事物窮變論（三十六年十月與責任之先生第三書）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又曰：「否極泰來」，此物極必反之理也，故物之茂盛於春夏者，至秋冬而衰息焉，物之衰息於秋冬者，至春夏又重生焉。夫窮者極之義也，變者反之義也，凡物至盛衰之極，必變而自反，於事亦然，反者動之機，機者變之始，故善處事者，必知待機以應變，否變於泰，必因而進之，順而推之，以速泰之至，期於早安民，泰變於否，必導之以政，化之以教，以使否之微弱，期於少病民，此為政之道也。今觀於史，亂之為期，已逾三世，此否極之時也，勢之必反，機之可動，其理甚明，守國主政之士，宜觀其機，善為之用，善用之道，在隨機應變，率性順情而利導之，則否去泰來而亂止，復何患治之不至乎。

滋亂原因論（三十六年六月與伍憲之先生書）

藉以國家之亂，源於已往百年歷史之演變，以及最近三十年教育之措施，是就治亂循環原則言，乃為必然應有之現象，此頗民國三十年著論，雖斷日本之必敗，然仍深慮中國至少尚有二三十年繼續之紊亂，故其時甚望朝野之士，能循建國必成之意，詳知哲學之用，發動多難興邦之機，以易治亂之勢，藉求縮短紊亂之年期，不幸觀之勝利後之情勢，僅見哲學偶然之自顯，而未見有人知所以取用之

，甚或如公所言，是已非人之言行，縱橫朝野，明哲之士，或心知其非，而未敢大聲以糾正之，於是淺見之士，或誤非爲是，或以剛求正，衝之言行反應，可決於事無益也，此政之所以敗壞，和之所以無望，亂之所以愈甚也。

進 諫 論 (三十六年六月與五友書)

夫進諫者，所以求在上者之正失也，正失之效，在於使在上者能受其言，而知其失，故進諫之道，必以能取信於受諫者爲原則，或以重人而使之信，或以重事而使之信，或以重理論而使之信，三者之中，必有其一，然後效乃可求，毛薛二公之諫信陵君，此以重人取信者也，陸賈之諫漢高祖，此以重事取信者也，茅焦之諫秦始皇，此以理論取信者也，諸公進諫，頗未知其取信之所寄，若以理論爲取信之資，觀之建議，似有所病，蓋停戰一議，諸公以身處於此，而無法言之於彼，然在受諫之人觀之，認爲言於一方，有失於中，甚或以失中之故，而疑其偏，足以致疑之議，而期聽諫取信之效，以言行反應之理，恐非通道，此類之所謂病也，若以剛柔之理論之，諸公建議，微近剛道，剛道之諫，固有可用之處，可用之時，然非所以適用於今日，故今日言諫，宜稍移其轍，循矢明理，「爲而不恃」，則庶幾其可乎。

歷史透視論蘇聯 (三十六年六月與陶伯川先生第二書)

竊嘗讀史，以爲今之世界，乃一擴大之戰國，而我國則爲此擴大戰國中之一員，隣邦蘇聯，頗似虎視列國，求滿貪慾之秦也，若不妥籌善策，以伐其謀，則我之未來歷史，益多血淚，將無疑義，伐謀

之道，宜觀蘇之爲政，而索其源。若論今日蘇聯之政態，有類呂尙「文伐」「三疑」之變，尉繚子散財弱隣之故智也。今彼以共黨爲郭開，若我能有術使之轉變爲廉頗，則其謀敗矣。如或共黨不願重國而爲廉頗，祇須我能和內而不殺李牧，則蘇聯雖能致我於亂，然不能致我於亡也。若更能善用盟援，以圖富強，則漸絕亂源，乃可斷言，此爲主國之大計。

第三國際探源論（三十六年五月與國民參政會書）

觀夫第三國際活動之往事，追索其政策思想之來源，認爲蘇聯在十月革命成功後，深感事事落人之後，未能與世界列強，并駕齊驅，惟有埋頭苦幹，以求進步，始可達到與列強并駕齊驅的目的，但又感列強亦能埋頭苦幹，同在進步，仍感望塵莫及，因審思所以阻止他國進步之方法，以顯蘇聯進步之價值，但檢閱往史，阻止他國進步之方法，僅有戰爭，以戰爭之力量，可以破壞他國之建設，消滅他國之民力，而又可使他國戰後已消滅之民力，消耗於再建設之工作中，以削弱其進步之價值，但戰爭並無必毀他國建設及戰敗他國之決定權，即使有此決定權，而亦無法逃避本國民力與兵費之損失，因是蘇聯乃採取保持民力運用兵費之辦法，以兵費散往各國，發動第三國際之政策，以爭利爭權爲餌，引誘各國自私之人士，發動不利於其本國之言行，以阻礙其本國之進步，使蘇聯進步能發生迅速追及列強之價值，就此中中國文化歷史以言之，實爲呂尙六韜「文伐」及「三疑」篇之變化，尉繚子助秦散財弱隣之故智，今觀蘇聯勝利前後之動態，對於取消第三國際之宣告，僅爲見於文字虛偽之行動，而非實際之行動，此觀於歐亞兩洲各國之動態，無不含有共產主義之色彩者，可以見之，而外蒙古之獨立，中蘇友好條約之簽訂，東九省機械物資之被奪，工潮學潮與夫反美空氣之波瀾，以及四國外長

會議討論中國問題之提案，皆為蘇聯實行或意圖削弱我國之事實，此一動態，如果不予阻遏，而任其自然之演變，就世界歷史前途言，必將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種子，就中國歷史前途言，幸能不呈分裂之現象，亦必成為延長紊亂年期之引線也。

哲學政治價值論

(三十五年九月與美教授羅勃脫斯屈拉滋書)

就中國歷史與中國哲學之研究，認為世間一切事故之發生，皆導源於人羣言行之變化，而人羣言行之變化，則導源於人羣心性之思動，故孔子施政方針，以親民率性為基礎，而施政原則，則以合於德意為條件，然後循此基礎與原則，以哲學力量熔化於政治中，以利導之，即可使現狀為化善之改進，而走向至善之境界，是故世間一切事故之變化，可視為無形之化學，而哲學力量，則為此無形化學中具有化善作用之因素，此種斷案，在中國歷史中，存有甚多之遺跡，惟在有人之研究而採用之。以政治之意義，以改進現狀為目的，而哲學則為估計現狀之情勢，協助政治發明改進現狀力量之基石，故孔子對於施政之見解，注重以德意為原則，以德意為哲學中具有最大化善力量之因素，用以推行施政，不獨可使施政所及之區域，能發生改進現狀良好之效果，亦可使千里以外其他之區域，能發生美滿之應聲，孔子此種見解，不獨有其治魯三月，道不拾遺之史實，為之證明，而孔子以前，及孔子以後歷史中，亦有甚多足以證明此一見解之紀錄也。

中國經濟價值論 (三十六年十一月與美國司徒大使第二書)

若論中國經濟之價值，可舉上海香港之歷史現象以證之，百餘年前之上海，為一沿海之原野，百

餘年前之香港，爲一海中之荒島，今俱成爲世界之都市，推求原野荒島所以成爲都市之原因，則得力於五種原素之化合，所謂五種原素者，就其大者言之，一爲英國之政策，二爲英國之計劃，三爲英國少數之財力，四爲中國大數之財力，五爲中國全部之人力，在此變化之中，說明中國所有財力與人力，祇須有良好政策良好計劃與合理財力之引導，力足將原野與荒島，使之變爲世界之都市，再就中國稅收以言之，上海之稅收，幾佔全國二分之一，此即說明上海以外各省市之稅收，僅佔全國二分之一，試問中國足以建設都市創造稅收之島嶼與原野，尙有若干，以少計之，必在十數以上，若是則中國可增之稅收，中國可增之購買力，試問又爲若干，此又說明中國富強後之稅收，足以自給而有餘，而中國富強後之購買力，實足協助有關各國商務之發展，亦足漸助有關各國經濟之平衡也。

重士論（三十六年十一月與上海吳市長第三書）

夫重士之道，以春秋之世爲盛，若論知士之別，以四君子言，春申君遷於孟嘗平原，而孟嘗平原則又不及信陵君焉，春申君有一朱英，不能盡用，卒無以避李園之禍，孟嘗君有馮驥，平原君有毛遂，俱能用之，一則使復已寵之相位，一則助威定盟於楚國，名垂竹帛，事傳後世，然皆久客門下而後知之，不若信陵君之有侯生，與有毛薛二公也，此三子者，俱未至信陵之門，而信陵之所屈節相訪，引以爲友者也。其後成救趙之功，收安魏之義，實侯生之計，與夫毛薛二公之言，有以致之也，於此，又可知用友之義，有勝於用臣用役者矣。

圍棋論（三十七年一月與司徒大使顧問傅涇波先生第四書）

國圍棋之學，肇始於中國，而廣行精究於日本，多數論者，俱視爲兵戰之學，實則兵戰政治兼具之學也。此觀於變者下子，不論其所佔棋局地位之大小，至完成兩眼即能安然無患者，可以知之，夫兵戰之道，重在爭，然尤貴能守其所勝，若不能守勝，則勝猶不勝也。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歸於勝利之結束，中國固爲勝利之一員，然迄今爲止，未能共享勝利之福利者，此國人昧於守勝之過，亦政治不爲守勝策劃之失也。今之論者，以爲一切紊亂，皆發源於戰爭，戰爭若不停止，一切紊亂，皆無法消弭，此其所見，實似是而非者也，戰爭固爲紊亂之因素，然不可不知政治具有化善紊亂之價值，故不問戰爭之源，不思清源之策，徒呼變方之停戰，是爲誤於偏見之妄想，而不知政治之價值，不重守勝之原理，錯認武力之萬能，亦爲失權輕重之見解，若謂化亂爲治之建設，必須以停止戰爭爲基礎，更爲不知圍棋之學，不知政治價值，受困環境，而無戰勝環境之勇氣與才智之人也。此觀於瑞士生存之事實，與夫圍棋弈者不向已具兩眼之處進攻之意義，可以知矣，夫圍棋之兩眼，以人生方式言之，一爲生活力之代表，一爲自衛力之代表，廣之以言家庭團體地方及國家，其理皆同，是故中國戰爭範圍以外各省市，而謂戰爭不停，卽無術爲化亂爲治進行建設之謀劃者，其誰信之，是則在於無有其人，與有無其才耳。

爲政之道論（三十七年二月與監察委員范爭波先生書）

夫爲政之道，以助民有養，而使安於生活爲第一，以助民有業，而使人盡其材爲第二，以助民有教，而能教育子女爲第三，以助民富庶，而能藏財於衆爲第四，以啓民盡責，而勵共衛國家爲第五，以睦鄰廣盟，而成化攻無敵之勢爲第六，爲政如此，則治道畢矣，故呂尚之論政有曰，『心以啓智，

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至天下」，此觀情審勢，衡量民心，用智用財，選賢用衆，樹立王政以和天下之大道也。

國家舟城喻（三十七年三月與陳衍森先生第二書）

蓋觀今日之情，以索未來之變，占知繼續紊亂之年期，勢將延長逾五十年也。此因多難興邦之機，未為國人所重，而復任因勝而驕之思想之毀之而不救也，夫國家如無牆之城，亦無形之舟也，城不能自為得失榮枯也。舟不能自為行止安危也，得失榮枯行止安危之權，實皆寄之於人，故一舟之人，果知舟行順流之前途為絕地，若轉向逆流善避之，則絕地將無能為，此哥哥布之改航，因而得達新大陸之故事也。一城之人，果知怨責薄守之結果為失敗，能一心一德堅守之，則失敗必自消滅，此傳將軍之困守，因以全涿州之近事也，先賢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人定勝天，觀乎此，則國家興亡，可知其權之所在矣，今日中國之象，雖如危舟，直趨絕地，然舵師之智，足以避之，惜以不急之務，因其智力，不克寧靜深思，而為轉舵移向之謀劃，斯可憂耳，以舵向不轉，無由改達善岸，則千言百計，皆空談也，今者舟人已舉代表，共輔危舟，果能一心一德，善諫舵師，求籌濟之益，策致遠之謀，則同舟共濟，實意中事耳。

間接賢人政制論（三十七年二月與監察委員范爭波先生書）

夫中國本為民本主義之國家，與民主政制之距離，初非甚遠，然非可不待輔助而驟變之也。今之選政，未能盡滿人望，論其所病，在於未審欲速不速之誠也。故日前與公論政，曾創「間接賢人政治

制度』之說，此本『爲政在人』之義，而行『以民助官』之意也。就已往史實言之，乃係幕府之制度，以近代政象言之，則智襄園之制度也。揆之往史，論及用人之道，有用師用友用臣用役之別，『間接賢人政治制度』之設策，實爲選拔賢達，輔佐在職官長，以廣用師用友之術也。文武用此，以王天下，桓公用此，卒成霸業；燕王用此，遂敗強齊；劉備用此，藉延漢祚，是皆史之可證，而其效至明者也。茲論今日之勢，旣非破敗之燕，亦無長阪之危，而推行仁政，易於見效，更愈於孟子之說宣王之時也。若政府能採納此策，而復善用美援，則十年之內，必足致中國於富強，而使主產爲堯舜也。

與芝加哥大學郝欽斯校長論世界政府書

郝欽斯先生閣下，三月二十二日，讀滙報所載貴會對於組織世界政府之主張，此誠世界人類之福音，聞悉之下，不勝雀躍。夫人類之思想，每因環境之感觸，與心性之所需，而發生變化，其變化之產物，以組織之現象言之，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國家，此為事之可見，而史有可證，竊以家庭家族部落國家之組織，究其思想之動機，在於謀安寧，廣互助，而防災禍，惟以家庭家族部落組織之力量，俱不足以防止災禍，於是進而有國家之組織，但自國家制度實行後，人類災禍，迄未消滅，甚或因科學之進步，而災禍尤烈，此無他，以主持國政之人士，違背立國之精義，其思想每為自私之錯覺所支配，因以棄其謀安甯廣互助之目的，而誤用國家之權力，小之造成國內貧乏饑寒或自相殘殺之災禍，大之造成兩國戰爭或多國戰爭之災禍，於是人類思想受此災禍環境之感觸，滋生心性互助博愛之要求，尋求所以避免或消滅災禍之方法，此種思想之見於歷史及事實者，以余所知，已有四次，第一次為中國老子孔子之倡導大同之治之學說，第二次為中國管仲等所試行之會盟稱霸之政策，第三次為貴國威爾遜總統之組織國際聯盟會，第四次為貴國羅斯福總統之組織聯合國，老子孔子俱無政權，其思想僅成爲學說，顯於文化之貢獻，會盟稱霸政策之實行，以及國際聯盟會之組織，雖皆見於事實，然僅造成歷史短期之休戰，俱未顯現消滅災禍大於國家之力量，至於聯合國之組織，至今仍在動盪之中，就前事爲後事之師言之，凡此往史，俱足資貴會研究組織世界政府之參攷。

老子孔子管仲等俱生於春秋戰國之時，此時時代環境，充滿兼併攻伐之戰爭，戰爭結論，或爲勝利，或爲失敗，或爲國土之擴張，或爲國土之削減或消滅，歸納言之，僅爲地圖界線之變化，於是人

類遭受殺戮之災禍，乃成爲地圖變化界線無意義之犧牲，此種悲慘動態，遂形成老子大同之治之思想，孔子更進而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原則，以期實現大同之治之理想，嘗周游列國，冀獲知音，以求行道；惟孔子之行道，不以富強一國爲目的，而以平天下爲止境，蓋必各國俱治而天下平，然後始可無戰爭，始可避免人類犧牲於戰爭之災禍，非如此，則雖貴爲卿相，亦不自安，故治魯三月，雖顯現道不拾遺之政績，卒以魯之君相，安不知危，不足有爲，遂辭相位，後受楚王之知，兵迎於途，又爲令尹子西所忌，道之不行，深知其故，乃歸隱於魯，致力著述，冀傳其志，以待後世，觀所著述，可見其心，凡此往史，頗可資爲貴會研究組織世界政府之資料。（說明一）

威爾遜總統生於世界第一次大戰之時，目見人類遭受犧牲於戰爭之災禍，死傷之多，破壞之巨，尤較前史慘烈，遂思所以消滅以後戰爭災禍之方法，因而形成組織國際聯盟會之思想，不幸此一思想之主張，首先遭遇貴國當時孤立派之反對，繼之國際聯盟會又成爲會員國中自私政略家之工具，結果國際聯盟會卒步中國戰國史五霸會盟之覆轍，而告毀滅，此就五霸會盟以及國際聯盟會往史研究之，斯知言行思動不以謀安寧而廣互助爲基礎，則最後結，必爲失敗與毀滅，故孟子之論管仲，即確斷霸術之不足法，以其僅知富強一國，以樹霸權，而不知謀所以平天下，以避免人類犧牲於戰爭之災禍，此就以史爲鏡言之，凡五霸會盟及國際聯盟會失敗之史實，又可循失敗爲成功之母之哲理，資爲組織世界政府之研究。（說明二）

羅斯福總統生於世界第二次大戰之時，親見人類遭受犧牲於戰爭之災禍，更較世界第一次大戰爲甚，因而想見第三次世界大戰災禍之危懼，亦如威爾遜總統之所思，欲爲人類消滅以後戰爭之災禍，遂發生組織聯合國之思想，雖然此一思想之進行，業已形成聯合國，並受貴國大多數人之擁護，但

不幸又遭國外之阻力，而世間少數之人士，因畏於阻力之聲勢，竟從而誤於錯覺，至間接支持阻力。（說明三）於是聯合國能否發生大於國家之力量，以避免人類犧牲於世界第三次大戰之災禍，遂亦成爲疑問，此或貴會所以欲以正義價值爲基礎，致力於組織世界政府之研究，又認世界政府之組織，具有成立之可能性，並確斷世界政府之力量，足以消滅世界毀滅之災禍，此一估計與判斷，就現時世界形數動態觀之，至爲準確，論其問題，在於如何建設正義之價值，如能扶助聯合國，使爲因勢利導之進展，而完成世界政府之組織與力量，以避免世界第三次大戰之爆發，而消滅人類之災禍。

關於現時世界形數之動態，世界第三次大戰之能否消滅，已成爲世人心中不易取決之問題，因製造戰爭之力量，受誤於錯覺者之支持，使建設和平之力量，已遭受不斷之打擊，因此就世界政府之觀點言，似已形成贊成與反對之兩派，於是閣下乃對贊成與反對之雙方，提出理由何在之詢問，是殆閣下已瞭解贊成與反對雙方多數人之心中，對於組織世界政府之精義，尚無清楚之認識，此閣下所以雖提出世界政府必可實現之結論，而對於實現之年期，又有五年或五十年以內之估計，此一估計之意義，殆在說明世人清楚認識正義之價值，與瞭解世界政府之精義，尙須經歷之年期，但就現時世界形數動態論之，除非史丹林元帥心中好大喜功殘忍英雄之觀念，能突然變爲偉大愛人之哲學，則在五年之內，欲期世界政府之實現，決無希望。（說明四）以余估計，實現世界政府最短之年期，如能詳密研究，切實努力，當爲十五年以後三十年以內之事，否則其實現之年期，即定爲一百年以內，亦不能視為過多之估計，一九四一年四月，余嘗寫「三國演義的治亂觀」論文，就當時世界形數之動態，推論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結果，以及中日戰爭之成敗，與夫中國與世界之命運，在此論文之中，雖斷定屬於侵略陣線之德意日，必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之失敗者。（說明五）日本必爲中日戰爭中之

失敗者。（說明六）但認為中國仍有二三十年繼續之紊亂。（說明七）而世界繼續之紊亂，亦具有五年至二十年以上之可能性。（說明八）此猶余在此一論文中，論斷世界第一次大戰之結果，非為亂之結束，而為亂之休息者，具有相同之感觸。（說明九）茲觀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結果，論其現象，乃為戰爭方式之變更，而非中止紗亂或短期休戰之結論，此一現象，在說明世界各國政治領袖之心中，不但未能消滅好爭之觀念，亦且未能使好爭觀念為暫時之休息，甚至以巧妙之技術，滋長他人好爭之觀念，以坐待漁人鷄蚌之利益，若據此動態以透視世界之前途，則其結果，必為黑暗與悲慘，自屬無可疑義，閣下與貴會想已察見及此，故有研究組織世界政府之思想，因此余願陳述闡此一問題之意見，以供閣下與貴會之參考。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余應貴國司徒雷登大使之約，因談論中美問題，而論及世界之問題，茲再舉要以陳述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余應約赴京，與司徒大使暨其顧問傅涇波先生共論中美問題，在第一次陳述見解後，曾向大使暨其顧問傅涇波先生建議，請於第二次再談時，提出任何問題，俾余得提供解答之意見，蓋余知中美問題之久懸，既非美國之不願援助，亦非中國之輕視援助，實係陷於見解不同之隔閡中，此一隔閡，若非設法解剖而澄清之，不但無益於中美之前途，亦且有害於世界和平之政策，甚願聽取問題而試為解剖，其後傅先生乃以世界第三次大戰是否能不爆發，舉以相問，余以傅先生之所問，為今日世界最大之問題，但就中國哲學言之，最大之問題可縮為最小之觀察，此即陰符經中所言，所謂「宇宙在乎手」。

今日世界之現象，如果縮小為地方現象以觀察之，乃為警察力量與盜匪勢力鬥爭之問題，若警察

力量足以控制盜匪之勢力，使行割盜匪，俱能迅速就逮，則決無人願嘗試刦掠，而效為盜匪，即行刦盜匪，亦將退籌洗手，而恩不為盜匪，但今觀世界之現象，猶如一無警察制度之地方，盜匪既可不患警察之逮捕，而又有有力之盜首為之策勉，於是不但盜匪必勇於行刦，而無所顧忌，且必足引誘具有貪慾之人，同為盜匪，如此而欲望人之不為盜匪，而欲望盜匪之不行刦掠，乃為必無之事，況今之所刦掠者，非為小利，乃中國歷史所言竊國者所爭之王侯，故此一地方必須迅速建立警察制度之力量，以防制盜匪之勢力，若不此之圖，而欲與盜匪首領謀妥協，以期縮小行刦之範圍，而求自身之苟安，論其結果，則英法放縱日本之失敗，實為最顯之史例，此觀余一九三二年警告國際聯盟會李頓調查團之論斷，可以知之，故以此為言，若不設法阻遏好爭觀念之進展，則世界第三次大戰之爆發，知必無法避免，但此非世界第三次大戰必須爆發之謂，以世界一切事變，俱含有無形化學之意義，果世人能持「天道論」與「天數論」之原則，而瞭解數形變化與消長盈虛之哲理，復循剛柔之哲學，善為運用而變化之，則一切形勢皆可變，不獨世界第三次大戰可有術變化而消滅之，即貴會所主張之世界政府亦可使之變化而見諸實現，此觀余中國治亂形數研究錄中之治亂形數圖，與序解諸文，以及附文與函稿，可以知之。

今年二月一日，余與傅涇波先生第四書，論及世界大勢有曰，「蓋今日世界之現象，極似擴大之戰國，而其趨勢之演變，則在孕育擴大之三國，所謂三國者，乃言世界動態之形勢，為三角式之發展，美澳兩洲為一角，歐菲兩洲為一角，亞洲又為一角也，在此發展之中，美持聯合國之目的，發揮互助之精神，期化天下為一家，蘇則以共產國際為手段，策勵鬥爭之慾望，意欲安坐而制天下，若以仁暴為衡，成敗之數，已可預見，但為減少蘇聯失敗以前八類痛苦計，美須以柔濟剛，善用其機，計劃

援助中國，而化育日本，再與英之西歐聯盟計劃相配合，此種措施，若果適用適宜，則蘇之未來命運，必如前與大使書中之所言，非因覺悟而相安，將坐於聯合國之門外，靜待失敗之結果，而夫美蘇之年期，與夫紊亂之損失與痛苦，必可因以縮短而減少也」。此言世界目前之現象及動態，與夫美蘇政策未來之成敗，假使美能善用以柔濟剛之哲學，觀機應變量力順序以推行世界和平之政策，則蘇聯非因覺悟而相安，必遭最後之失敗，若論蘇聯失敗之方式，非步近史世界第二次大戰德意日失敗之後塵，必步往史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失敗之後塵，以秦始皇失敗之方式言之，世界政府之實現，當為五十年以後一百年以內之事，以德意日失敗之方式言之，世界政府之實現，為三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內之事，若果美之世界和平政策，能善用以柔濟剛之哲學，觀機應變量力順序變化而推行之，則世界政府之實現，可於十五年後三十年以內見之。

貴會世界政府之主張，猶如一房屋之圖樣，若欲依此圖樣，建築房屋，必先削弱阻礙建築房屋之勢力，并使世人瞭解建築房屋完成之價值，就削弱阻礙建築房屋之勢力言，以今日世界形勢論之，必須置重點於亞洲，以建設中國而化育日本，如余與司徒大使第三書，贊傅經波先生第三書之所言，果能如此，則十年之後，可見中國之富強，而完成亞洲之團結，於是西歐之聯盟與亞洲之聯盟，遂成為世界和平政策之兩翼，而以美澳兩洲為中軍，若是則化攻之力足，制暴之勢成，不獨共產國際之政策，失其制勝之價值，亦且足以削弱其勢力，使之覺悟而相安，此為策劃組織世界政府之大道，惟此大道之建設，必須以仁義為基礎，仁具博大愛人之意旨，義具化攻制暴之意旨，但博大愛人之仁之為用，必以化攻制暴之力為後盾，否則仁之為用，將無效果，此觀於雅爾達協定之犧牲，不但未能獲得國共之合作，與停止第三國際之活動，而反造成中共佔據東北，外蒙窺視新疆，與夫歐洲九國共產國

際之火炎，可以知之，最近陳納德將軍以重視世界和平政策而重視亞洲，以重視亞洲而重視援助中國，並論斷援助中國之價值，非成爲消滅世界第三次大戰之關鍵，即將成爲世界第三次大戰制勝關鍵之言論，實與余之見解，完全相同，（說明十）因是世界和平政策之進行，應研究如何援助中國，而能使之發生價值，此則高斯先生出席貴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之言論，又宜予以重視，高斯先生之言有曰：「君誠不能使中國人爲其所不願爲者，但君大可與中國人通力合作」，此爲孔子率性順情之哲學，亦爲論政論教具有價值之名言，假使貴國能以此二語爲援華政策之基礎，而復以余前與貴國羅勃脫斯屈拉密接書，與司徒大使第三第四書，暨其顧問傅涇波先生第一第四書，及近與高斯先生書，參閱而研究之，則中美間之隔閼，必可迎刃而解，因以助成中國之富強，使之成爲世界和平政策力量之期望，亦可見之於實現，若論實現中國富強之年期，則爲十年或十五年，前言十五年後三十年內完成世界政府組織之論斷，即以此一見解爲基礎，至於中國如何能於十年或十五年變爲富強，則請參閱余與上海吳市長第七書，與黃任之先生第四書，與陳衍蓀先生第二書，及近著攻心變數論國事一書，可以知之，茲將上述各項文件，一併錄奉，以資閣下與貴會研究組織世界政府之參考，倘或有何疑問，如蒙垂詢，自必樂爲分析之解答，謹本愚者一得之說，陳其所見，幸明鑒焉，肅此奉達，順頌道安
任矜頽拜啓

創設崇文學院徵求發起人啓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勉博學之士，不可不深思所學，求所以用之以致益於人羣，亦勉少學之士，不可徒思致益人羣，而不自省不足，以求力學以益之也。夫堯、舜、禹、湯、伊尹、周公、孔、孟、黃、老、明君、賢相、名將、碩士、奸臣、惡吏、權富、勢豪、以及販夫、走卒、盜匪、乞丐、等爲圓頭方趾能言能行之人也。其所異者，在於學耳，蓋人之言行，皆命思想，思想傳命，取資效像，效像之本，寄於耳濡目染之事實，與夫前言往行之紀錄，見聞事實，爲人生所接觸之知識，言行紀錄，爲人生宜學習之學識，凡前言往行足資紀錄而能久傳於世者，是爲言行之選，乃言行之精華，此足以取法之文化也。亦即爲人之道之規範，由是知人之心胸，皆藏有爲人之道之藍本，若就思想取資效像傳命而言之，則知言行取法，實發源於心胸無形之藍本，於是又知人之爲聖、爲賢、爲忠、爲奸、爲善、爲惡、爲智、爲愚，皆成於無形藍本知識學識之蓄儲，與夫損益變化之應用，若是則學之於人，關係重大，更可知矣，廣之以言家庭，以言團體，以言國家，其理皆同，以國家爲家庭團體之積，家庭團體則人之積也，家庭團體國家俱不能自爲貧富苦樂興衰強弱也。貧富苦樂興衰強弱之形，皆成之於人之言行，亦猶人之聖賢忠奸善惡之成之於言行，與夫言行之成於思想取資學識知識之應用也。此先賢論教論政，所以有「變化氣質」「人定勝天」之說，又有「不教而誅」「見善而怠」之諦也。觀夫此，則中國之所以亂，所以貧，所以弱者，可以知其源焉，而化亂建治，易貧弱爲富強，亦可深思而見其道矣，原國家之立，要素有四，曰武備，曰政治，曰經濟，曰文化，武備所以防攻，政治所以安民，經濟所以養民，文化則指揮武備政治經濟之運用，能

適於分而合於時，若武備政治經濟之運用，俱能適於分而合於時，則內無教養盜匪之憂，外有化攻睦鄰之樂，此盛治也。考之往史，堯舜致之，今之未能致於此者何也。曰武備政治經濟未能受命文化而能適分合時之運用也。深思其故，則非患於無文化，患於不思文化損益變化以致用，及不知不足未能力學以取用之，前者罔之病象也，後者殆之病象也，若罔殆病象，見於政治，斯爲一世之亂，罔殆病象，見於教育，斯又一世之亂，故憂亂望治，不宜寄意於斥責，寄意於嘆息，更不可以斥責而尙爭，以嘆息而棄責，應循天道論之原則，誠其意以治病，誠其意以益國，非若是，不獨不足以止亂，或且因以滋亂矣。孔子治魯，困於環境，未能廣用所學，去而周游列國，列國遭遇，或以敬而未能專任，或以受重而毀於妒忌，乃退而歸隱，輕視相位，重視著述，欲使後世知文化之價值，能爲損益適分合時之取用，而期致益於人羣，此知乎天道，重爲予而不責不取也。窮天之爲照，無所不及，及於植焉而生，不以爲功，及於不植而無所生，不以相責，以重在爲予，而不責不取，固知無益於滋生，然可無害於爲照，亦可無害於所可生，或不取而責焉，責則爭，爭則有害於所可生，老子曰，「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憂亂望治之士，宜深思其義，而共同致力於文化，文化之力，如能愈教育罔殆之病象，則可縮短三十年之續亂，文化之力，如能兼愈政治罔殆之病象，又可消失十五年或二十年之紊亂，以此爲言，則今日弱亂之中國，可賴文化之力，於十年之後，見其變爲富強矣，上海市各區區民代表會主席聯誼會同人深信此義，不計力小之無益，乃有創設崇文學院之計劃，華正中先生贊其議，捐自有之地九畝餘，以爲院基，並商准唐蔚芝先生主其事，茲附計劃於後，以一院之成爲之始，期信於取證而廣之，近以致遠，卑以登高，則千里峻嶺，俱可涉而踰之也。凡憂國士女，果信此爲治病化亂益國之方者，願共同奮起而與其事，庶十步芳草十章忠信之喻，足以勉引而自慰也，是爲啓。

說明

(說明一)孔子爲中國哲學政治家，魯定公時，初爲中都宰，施行哲學政治，以治其民，行之一年，民無養生送死之憂，而有道不拾遺之樂，四方諸侯，聞風取法，定公問孔子曰，「舉子此法，以治魯國，如何？」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越年，進爲大司寇，齊景公謀與魯脩好，請會盟於夾谷，孔子諫請備兵，隨定公赴會，以禮服景公，以法威齊將，使齊返魯侵地，越三年，孔子攝相事，憲勸并施，惡除而民化，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奢侈淫蕩囤積虛偽之風，不復見於魯國，三月而魯大治，諸侯敬懼，齊景公尤畏忌，歸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辭相位，周游列國，思行其道，卒無所遇，既蹉跎之不行，而又深知其故，乃歸隱于魯，致力著述，翼傳其志，後世用其所言，施於政教，皆著顯效，宋相趙普之治，即得力於論語一書，最近貴國高斯先生所言，「君誠不能使中國人爲其所不願爲者」一語，即近孔子率性順情哲學政治之原則，此非言高斯先生之言，係得之於孔子之書，抑亦如孔子之嘆道之不行，感於若干動態之深思，而知其故，假使貴國能以此言爲推行援華政策之基礎，則中美合作，必見顯效，若更以孔子之經歷與學術，資爲推進組織世界政府之參考，則可斷必能有益於貴會研究之工作。

(說明二)五霸會盟之失敗，俱因以富強一國爲目的，而不知以防微杜漸，持危扶顛，化以政教，以平天下之正義爲基礎，義利倒置，失敗爲無法逃避之結果，國際聯盟會之失敗，亦因英法重視自身之利益，而忽視盟約之正義，不知防微杜漸之所致，假使當時國際聯盟會能本防微杜漸之哲理，重視余一九三一年對李頓調查團所提觀察世事演變之警告，起而主挂正義，執行盟約，則不獨意德兩國不

致效尤侵略，英法兩國亦不致自受創傷，而國際聯盟會更不致因以毀滅，以觀余與李頓調查團意見書及去年與司徒大使第二書之所言，可以知之，茲將二書所言，有關於觀察及論斷者，錄其原文如左。

與李頓調查團意見書有曰，「蓋自來戰爭之結果，不論勝敗，必有死傷，至若產業之損毀，戰費之虛靡，又必成為戰爭以後毫無意義之紀錄，而雙方人民之幸福，人類文明之進程，更不能不因人力物力之損失，發生不良之影響，且其影響所及，又須及於與雙方有關係之其他國家也，證以最近世界各國經濟危難之狀況，失業統計之事實，則戰爭為害，益見明顯，就此推想，國際條約之尊嚴，尤應重視，日軍暴力之制止，尤應迅速也。不然，祈求和平，酷愛人類之中國，亦必為忍無可忍情勢所逼迫，本其長期抵抗之決心，實行應付暴力之計劃，若果實行計劃，見諸事實，姑不論雙方人力物力之損失，即東方市場之毀滅，購買能力之消失，必足使國際間之商務與經濟，發生惡劣之變化，國際愛護和平會員國之人民，將續受暴力之摧殘，可斷言也。」（見意見書第三章，日軍暴力與國際關係，第五頁至第六頁），又曰，「此種破壞和平，摧殘人類之暴行，就國聯會之責任言，應運用國際合作之能力，加以重懲，即不然，亦應運用國際合作之能力，實行制止，乃國聯會過去之工作，未嘗有此，英代表薛西爾爵士之公論，既未充分發生效力，德代表寇蒂斯外長及挪威荷蘭代表之憤言，亦未為議場所注意，而日代表反對調查反對干涉之狂態，反成為壓制正義之勢力，此後國聯行動，愈趨愈下，但見日本武力，在國聯阻止事態擴大決議之下，製造蹂躪我國土地，殘殺我國人民，繼續不絕之事實，此國聯優容日本，自食諾言，坐視武力撕毀決議，有以使之然也。」（見意見書第二章，國聯過去工作之感想，第三頁），又曰，「國聯會員大會中，似已顯然分為兩派，一派持列強聲威不可損毀之主張，以英法兩國政府為此主張之主持人，一派持國聯尊嚴不可侵犯之主張，以各中小國為此主張之

主持人，而可以同情於此主張者，不獨有美意兩國，即英法兩國人士，亦有表示同情者，英前代表薛西爾與英議員藍斯葆之言論，及孟鳩斯德指導報之態度，皆為甚有力之證據，而國聯行政院前主席法外長白里安之死，亦為一相當之證據，據同人研究之結果，敢斷定白氏為一主張公道之人，因受法國政策與行政院祕密會議環境之阻礙，使其個人之公道主張，不能充分發揮，致病之源，或由於此，此觀於其對歷次議案所發之宣言，可以知之，查白氏所發宣言，處處為議案補缺陷，為議案增力量」。（見意見書序言，第三頁），又曰，「故下列各簽字者站於世界人類之立場，深望責委員國之能謹慎詳思，辨别利害，因解救人類厄運，鞏固國際和平之要求，對於日軍暴力，速謀聯合之制止，或施嚴重之懲罰，此為國聯會應負之責任也。倘國聯會至此猶不自悟，猶不自決，則恐公正代表及世界輿論所發國聯自殺之呼聲，或不幸而成爲識語也。」（見意見書第三章，日軍暴力與國際關係，第六頁），又曰，「此後國聯行動，愈趨尷下，但見日本武力，在國聯阻止事態擴大決議之下，製造蹂躪我國土地，殘殺我國人民，繼續不絕之事實，此則國聯優容日本，自食語言，坐視武力撕毀決議，有以使之然也。下列各簽字者，站於中華人民之立場，或世界人類之立場，對此過去工作，不能不發不平之悲鳴，以為國聯會之行政院注意認審集議，放棄盟約威權，猶如法官忍受暴力之攻擊，自願毀其法律，自願棄其職守也，宜乎國聯威望失墜，國聯生存危險，成為世界輿論中之評判也。下列各簽字者對於國聯過去之工作，雖有所責難，然對於國聯未來之自救，仍未絕望，甚願貴委員團能諒其負責敢言之愚，恕其對於賢者之唐突也。」（見意見書第二章，國聯過去工作之思想，第三頁至第四頁。）

與司徒大使第二書有曰，「一九三二年三月，蘋會建議於李頓爵士國聯調查團，請國際聯盟會制止日本之侵略，其時不獨德外長寇蒂斯代表德國，力主正義，美意兩國以及英法公私之人士，亦力持

國聯尊嚴不可侵犯之主張，若論此時之勢，僅爲熒熒之火，不但英法兩國手中，持有充分之水，足滅此火，且可將擁護盟約各國之公義，能使之變以爲水，欲滅此火，事實甚易，卒以英法兩國，計不及此，卒致意德行動，漸變爲火，轉成炎炎之勢，不獨英法所持水量，不足救火，甚至水養於火，沸而傷身，此爲最近之前史。」（見與司徒大使第二書抄本，第二頁。）

（說明三）蘇聯第三國際政策之來源，觀之第三國際探源論一文，則其用心所在，已顯然可見，而世人竟有受其蒙蔽，而予以支持者，就英國言，此爲林賽爵士，就貴國言，則爲華萊士先生，去年二月，余與英上議院喬維特議長書，今年一月，與司徒大使第三書，對於二氏所言，皆有評論，茲將是項評論，摘錄於後。

與喬維特議長之書有曰：「竊思中國作戰時之戰區，共有十二單位，假使此十二單位之司令官，俱於勝利後憑藉兵力，而效中共之所爲，即可成爲十二國，再加國共兩黨，各成一國，復以戰後獨立之外蒙古合計之，則中國即可分爲十五國，今之未至於此，實應歸功於蔣主席之威德，與中國舊文化之價值，今林氏既未研究中國歷史，又不瞭解中國舊文化之價值，竟在貴院公開發表誤解蔣主席，與藐視中國舊文化之言論，並且承認中共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擴大紛亂範圍與延長紛亂時間之固執行爲爲正當，果如此，則林氏是否因十二戰區司令官不效中共之所爲，而笑其皆爲不知割地爭權絕對愚蠢之人物，余之如此評論中共，林氏或將誤解余爲中共之反對者，於此，余不得不向諸君作一聲明，余與任何黨派，俱無關係，而爲一絕對超然中國之人民，余之所以與任何黨派俱無關係之故，并非余之人生歷史，缺乏與黨派發生關係之機會，亦非余之見識能力，尙未符合參加黨派之條件，實因受中國舊文化之指示，欲保持超然之風格，若論余之人生歷史，在一九一九年五四學生運動時，已薄著聲譽

，而今日政府要員，亦頗多舊友，惟迄今為止，余不獨絕未向之有所干求，亦不作密於往之還聯系，至於余對中共之態度，素持愛重，諸君祇須一閱余去年九月與美教授羅勃脫斯屈拉滋氏論中國問題書，即可知之，此外余尙須再作另一聲明，即余今日對於中共之評論，其分量已較去年與羅氏書中所言者為重，此因余鑒於中共之不參加國民大會，與欲廢止已包含政協原則而制定之憲法，及拒絕政府派員前往延安商談改組政府之建議，實覺其缺乏理由，此非中共為重視私慾之錯覺所誤，即係中共為另一勢力所困擾，若二者之中，果居其一，即應視為不賢明之決斷，林氏對蘇聯之論衡，認為未予中共以積極之支持，此為國際政治家近於賢明之言論，若再進能循「愛人以德」之義，勸告蘇聯，請其不忘中國為戰時之盟友，而減少或放棄其對中共消極之支持，更進能再勸蘇聯，轉勸中共，根據重視「國家利益」之觀點，善用今日軍事上之勢力，就愛護國民黨過去創造中華民國之功績，協助蔣主席與國民黨中賢明之人士，以勸導糾正或懲罰貪污腐敗與無能之國民黨黨員，則可有益於中國，亦可有益於世界之和平，若是則林氏乃可被稱為具有遠見真正賢明之政治家，不幸林氏卒以「蘇聯觀望態度能否久持」之間語，作為論衡之結論，余今推想此結論，深慮此一結論之含義，不獨可視為具有威脅性之對英言論，亦可視為具有鼓動性之對蘇言論，至於輕視中國，更無論焉，此其無益於中國之時局，無益於世界之和平，實可斷言，倘林氏此一言論，更不幸而引起貴國不瞭解中國時局者之盲從，或推進蘇聯對中共為積極之支持，則不僅中國最慘之悲劇，將從此開幕，而今日世界人士所畏懼之第三次世界戰爭，亦將因此而產生一爆炸性之引線」，（見與英上議院喬維特議長書抄本，第七頁至第十頁）。

與司徒大使第三書有曰，『華氏之競選演說有曰，『增產濟貧，以致和平，資本主義之政策，與

共產主義之政策，果孰爲優，應彼此競爭而證之」，此其爲言，不獨似是而非，實亦無視現實而背於理，以理論言，增產濟貧與和平，非主義之名所可致，必以仁義之心，運用主義而致之，夫心在於內，言行之本也，名在於外，言行之末也，華氏重末而不重本，悖於理矣，以現實言，今日共產主義之所爲，在於資盜以援，劫富濟貧，騙貧就死，因以樹黨壯勢，以遂私慾而已矣，故論其行，猶不如中國稗史中之義盜，義盜所刦，每爲不仁之富，而濟無所利用之貧窮，是非利害，顯然可見，而華氏重之，抑何無視現實而不辨是非利害之甚也。（見與司徒大使第三書抄本，第三頁至第四頁）

（說明四）余近與高斯先生論中美問題書，其間論及史太林元帥者有曰，「陳納德將軍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論斷，至爲準確，因史太林元帥乃係一玩弄世界人物特出之英雄，而非胸懷超越偉大的政治家，英雄之目的，在於『好大喜功』，而不顧人類之痛苦，求遂『貪得無厭』之慾望，亦不能瞭解他人善意之愛護，故羅斯福總統勸請蔣主席忍受雅爾達協定犧牲之措施，雖以愛護世界人類愛護盟友爲觀點，欲以中國偉大之犧牲，補助蘇聯戰時之損失，而换取史太林元帥『好大喜功』『貪得無厭』思想之止步，然此種『愛人以德』之善意，卒未能爲史太林元帥所瞭解，不獨使羅總統身受設策錯誤之遺恨，亦且使蔣主席深感犧牲無謂之痛苦，以雅爾達協定犧牲所得之代價，非爲和平相處之事實，而爲「以怨報德」之暴行，於是知不明於情，不審於性，而證飼虎弭患之失計。」（見與高斯先生書抄本，第三頁至第四頁）

（說明五）請參閱敬致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諸公書說明三

（說明六）請參閱敬致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諸公書說明四

（說明七）請參閱敬致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諸公書說明五

(說明八) 請參閱歐陽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諸公書說明六

(說明九) 余在三國演義的治亂觀中，論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形勢有曰，『以上幾段摘錄，是在證明世界範圍內「自然數字」演變的趨勢，仍舊走在「亂」的路程中，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時期，算是「亂」的休息，并不是「亂」的結束，祇須一有間隙，「亂」便繼續發生，續受暴力的摧殘』，(見三國演義的治亂觀抄本，第八頁至第九頁)。

(說明十) 一九四六年九月，余與羅敦授論中國問題書有曰，『蓋就中國歷史治亂循環之原則，研究其演變之趨勢，此次戰後中國之現象，頗有成為十餘國或六七國之可能，今除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外，僅有國共兩黨之鬥爭，此或已為不幸中之大幸，竊思中國作戰時之戰區，共有十二單位，假使此十二單位戰區之長官，俱各憑藉兵力，而效共產黨之所為，則可使中國分成十四國或十五國，或則留存於中國之日本軍人，與中國自私之軍人與政客相結合，在東北華北華南華中各區域，紛起假託民意，樹立民主聯軍、組織民主政府，亦可使中國分成六國或七國，今日中國之未至於此，若以史家之觀察評斷之，一方應歸功於蔣主席之威德，一方應歸功於美國重視世界和平政策公正之精神，另一方面則反映中國古代文化價值之存在，倘以美國公正之精神，協助蔣主席之威德，發揚中國古代文化之價值，以推行具有『化善』現狀力量之哲學政治，則十倍於國共兩黨以外無黨派之人民，必羣起擁護蔣主席之政策，或則因此完成中國和平之政治解決，或則在國民黨實行還政於民之事實下，可使聽命於國際勢力之共產黨員，因此陷於孤立，而為其他各黨賢明人士無黨派人民所輕視，至於支持共產黨之國際勢力，因此時或尚未敢冒險發動戰爭，將無可奈何，或因無可奈何之故，轉而認識世界和平政策之價值』。(見與羅敦授書抄本，第三十七頁至第三十九頁)。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與司徒大使第二書有曰，『若再循將主席對日寬大之事實，運用中國哲學之價值，以推進日本人之思想，使中日兩國俱樂走向化敵爲友互助互愛之途徑，則在亞洲共產國際之勢力，必可有肅清之辦法，甚或於必要之時，可進而協助肅清歐洲共產國際之勢力，此非意存對蘇作戰之謂，乃欲糾正蘇聯損人利己共產國際之言行，而使蘇聯鑒於各方共產國際勢力之削弱，勿再向「得意再往」之歧途，推行其錯誤之政策，轉而承認世界和平政策之價值，重思對於貴國羅斯福總統之諾言，實行停止第三國際之活動，此爲以戰備戰愛人以德化亂爲治之措施，否則蘇聯最後之結論，惟有坐於聯合國機構之門外，靜待失敗而已，此就治亂循環原則言，實爲無法逃避之趨勢』，（見與司徒大使第二書抄本，第七頁至第八頁）。

一九四八年一月余與司徒大使第三書有曰，『夫人類進化，由個人而家族，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國家，由國家之進展，有孔子之求治國平天下之大同，有威爾遜總統之組織國聯會，有羅斯福總統之組織聯合國，此皆先賢博大愛人最高之理想，果欲實現此理想，須循率性之道，審剛柔之理，以仁義爲心，用化攻制暴之學，始能有濟，若既不知化攻之仁，又不知制暴之義，此國聯會之所以毀滅也，今觀貴國之情，以近者言，仁義精華，孕育於威爾遜，發揚於羅斯福，散而蘊藏於杜魯門馬歇爾范登堡艾森霍華杜威諸公及羅斯福夫人之心，且又有國聯會失敗之史實，以證已往孤立派之過錯，果能以艾森霍華之思想，與杜魯門馬歇爾范登堡杜威諸公及羅斯福夫人機智義勇之力相化合，進而糾正華萊士派系之錯覺，運用蔣主席心胸中之哲學，藉以一貴國之人心，而助中國之善化，因以和合日本，而聯繫英加澳洲及惠於聯合國之會員國，若是則聯合國內部之黑白分，世界內含之數字變，而世界治亂之趨勢，亦因阻遏而俱變，蘇聯將無能爲矣，或臨以化攻之仁，或憲以制暴之義，選擇之權，乃

在掌握，於是第三國際之衛冕，共產主義之勢敗，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胚胎，非因義而墮，必因仁而化矣。（見與司徒大使第三書抄本第二頁至第三頁）。

說明

573

46226

大光書
上海牯嶺路

